

# 茅盾在长沙:我们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

20世纪30年代,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,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。随着战火逼近,大量的文教机构和文化名人入湘,湖南一度成为抗战的重要基地。据不完全统计,仅1937年至1938年,先后来到湖南的文化名人就有1500多人。他们以笔为矛,以艺为盾,坚守文化阵地,凝聚抗战力量,书写了湖南文化抗战的壮丽诗篇。著名作家、文学评论家、社会活动家茅盾(1896—1981)就是其中重要一员。抗战期间,茅盾先后两次来到长沙,为湖南文化抗战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

1938年10月,茅盾夫妇与女儿沈霞、儿子沈霜(伟翰)

## 安置子女,在湖南大学作了一次讲演

1937年8月13日,日军侵犯上海。在飞机、坦克和大炮的狂轰滥炸下,上海变得满目疮痍。10月10日,茅盾携子女由上海经武汉到达长沙。这是他第一次到湖南,可惜行程匆忙,仅停留10日就去了汉口。

茅盾此次长沙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安置两个孩子。茅盾与妻子孔德祉婚后育有一女一子:女儿沈霞,小名亚男;儿子沈霜,小名阿桑。到了长沙后,茅盾将亚男送进了周南女校,将阿桑送进了岳云中学。他对两个孩子都十分疼爱,可兵荒马乱的年月,家人离散,实属无奈。

虽说在长沙停留时间短暂,可应湖南大学邀请,茅盾为师生作了一场讲演。他与湖大的结缘,是因为黄子通。黄子通是浙江嘉兴人,哈佛大学哲学博士,当时在湖大任教。黄子通妻子陈达人与茅盾妻子孔德祉是同学,两人曾在上海爱国女校就读。茅盾将子女送至长沙求学,正是听了陈达人的建议。彼时,长沙的中学实行男女分校,周南女中、岳云中学这两所名校,也是由黄子通夫妇代为联系的。经黄子通安排,茅盾在湖大的讲演如期举行。通过与湖大师生的近距离接触,茅盾对这所湖南境内的最高学府颇有好感,此后也一直留意湖

大的动态。1938年4月12日,茅盾在香港《立报》发表《记两所大学》,对湖大赞誉有加:“今春敌机屡袭长沙以后,临大(国立长沙临时大学)是西迁了,但湖大依然在原地开学,且已为流亡青年在华中所能得的唯一的转学借读之所;两个月前,黄河阵线颇觉吃紧的时候,听说湖大当局准备于万一之际,迁往湘西,现在前线反攻胜利,方幸湖大可以始终不动,屹然为华中唯一学府,给东南战区里流亡出来的青年就近得一求学的机会,却不料敌人摧残文化的魔手始终不肯将它放过。”

茅盾写稿的两天前,日军出动27架飞机空袭长沙,轰炸湖大等处,造成38人遇难,70余人受伤。湖大的图书馆全部被毁,科学馆也损毁三分之一。文中,茅盾不无愤慨地写道:“岳麓山是长沙近郊另一名胜,山上除了两大学外,惟有农舍,惟有坟园和庙宇,所以敌机的轰炸无非是蓄意摧残我们的文化机关罢了。中国的民众将永远不忘记这新添的血债!”

徐特立“贸然”来访  
此次长沙之行还有一段小插曲——徐特立的“贸然”造访。茅盾后来回忆:“我走下楼,看见一位皓首老人,两眼炯炯有神。我不认识他,正想发问,他已站起来自我介绍:‘我是徐特立。’”茅盾与徐特立不期而遇,又惊又喜,因

为徐特立是他“在抗日战争开始后第一个接触到的以公开身份活动的共产党人”。两人在黄子通的寓所一见如故,围绕国共合作、战争形势、长沙观感等话题开怀畅谈。徐特立还谈起茅盾的短篇小说《大鼻子的故事》,对其“极力称赞”。两人谈了一个小时,临别时,茅盾问徐特立怎么会知道自己的行踪,徐特立笑着说:“我有‘耳报神’!”

一家团聚,在半个月内写了5篇文章  
1938年1月12日,茅盾与孔德祉由上海经广州来到长沙。此时,两个孩子已经放假,一家人正好团聚。与第一次到长沙不同的是,此次停留时间多了几日。因此,茅盾“把生活从‘战时’状态调整为‘平时’状态”——撰写文章成为茅盾在长沙期间主要写了5篇文章,发表在《抗战文化》《抗战日报》《救亡日报》等宣传抗日的报刊上。

其间,在《抗战文化》上发表《参观一个难民收容所以后》;在《抗战日报》上发表《为着幼年的中国主人》《忆钱亦石先生》;在《救亡日报》上发表《这时代的诗歌》和《第二阶段》。

茅盾笔下的长沙  
茅盾第一次到长沙时,来去匆匆,没有仔细观察这座城市,整体感觉是“战争的烽火似乎尚未照亮这里的死水塘,“看”一切。宇宙万汇在动作中,在静止中,在我印象里,我都能抓定它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,但我的爱好显然却不能同一般目的相合。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,另外一句话来说,就是我不大领会伦理的美。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,却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。((《自传·女难》))

沈先生的这个“自我鉴定”是相当准确的。(摘自《远方有人在歌唱》汪曾祺/著人民文学出版社)

仅仅是积年沉渣泛起几个气泡,染上了一层抗战的色彩”。然而,当他再到长沙时,观感却截然不同:“大街两侧的墙上贴满了大幅的抗战标语和宣传画;打着小旗的女学生募捐队不仅在街上走,而且挨户拜访长沙的深宅大院;书摊上摆着《毛泽东传》《朱德传》这一类的小册子,而且销路很好……”茅盾说,短短几个月时间,长沙有了“触目的变化”。随之而来的,是湖南抗战的“色彩”愈发浓郁。

“仰天喷出腔中血,化作长虹碧碧霄。”多年后,茅盾将两次长沙之行详细记在回忆录《烽火连天的日子》中。茅盾写道:“在抗日战争中,文艺战线也是一条重要的战线。我们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,我们要用它来描绘抗日战士的英姿,用它来喊出四万万同胞保卫国土的决心,也用它来揭露汉奸、亲日派的丑恶嘴脸。”

毫无疑问,茅盾两次到长沙,虽时间短暂,却意义深远。他与湖南广大文艺工作者一道,“握着文化的火炬反抗侵略”,开创出抗战文艺的新局面,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。如今,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去,但抗战文化、抗战精神依然闪耀着光芒,而且代代相传,历久弥新。

## 汪曾祺:沈从文骂我“没出息”

横在我们面前的许多事都使人痛苦,可是却不用悲观。社会还正在变化中,骤然而来的风风雨雨,说不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,卷扫摧残,弄得无踪无迹。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,和工作的虔敬态度,是应当永远存在,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!

寂寞安静,是艺术创作所必需的气质。一个热衷于利禄、心气浮躁的人,是不能接近

自然,也不能接近生活的。沈先生“习静”的方法是写字。在昆明,有一阵,他常用毛笔在竹纸上书写的两句诗是“绿树连村暗,黄花入梦稀”。

我就是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。我看一切,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掺加进去,估定我的爱憎。我不愿问价钱上的多少来为万物作一个好坏批评,却愿意考查他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。我永远不厌倦的是

沈从文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。个人得失事小,国家前途事大。他曾经明确提出:“民族兴衰,事在人为。”他总是想激发青年的自尊心和自信心。“在事业上有以自现,在学术上有以自立。”他最反对愤世嫉俗、玩世不恭。在昆明,他就跟我说过“千万不要冷嘲”。

1946年,我到上海,失业,曾想过要自杀。他写了封长信把我大骂了一通,说我没出息,信中又提到“千万不要冷嘲”。他在《长河》题记中说:

沈从文

去看年轻时的一个朋友,算来已有二十多年不见了。是去医院看他,听说他的病有点严重。让人欣慰的是,新的病房大楼条件非常好,像星级宾馆似的,有空调、有卫生间,床头有直拨电话。阳光明媚。

更让人欣慰的是,他看起来状态不错,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。揪紧的心立刻轻松下来。我历来害怕探望垂危的人,那种情况下我会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但他咳嗽很厉害,每说一句话就要咳一阵。他却偏偏不停地咳,不停地咳,不停地咳;不停地咳,还是不停地咳。

他说医生“小题大作”,夸自己体质好,健壮如武松,人家以为他是陪老婆来住院呢。

他又说癌症现在算啥大病,何况自己现在癌细胞奇迹般消失了,说不定是当初“误诊”呢,老婆现在就请专家会诊去了。

他说春节时儿子自编自演的小品在公司的年会上得了一等奖,这小子每次来总逗得他乐不可支。其实儿子的幽默基因就是他的遗传。

我相信他的病没什么,至少没传说的那么严重。医生进来。可巧是我曾经熟悉的医生,我便跟出去询问朋友的病况。医生说:“他已是晚期,情况很糟糕了……”

回病房,他依旧谈笑风

# 蒙在鼓里

莫小米

春节期间,给舅妈打电话问好,她说:“我刚祭拜过,你二舅过世已经三年了。”

我跟二舅之间有特殊的联结,从小很熟,感情极深。我患癌之前半年,二舅检查出来得了风险很大的恶性肿瘤,医生给出的时间是半年到一年。我们一起抗癌,时时互相鼓励。

他最后一次住院前给我发语音消息,当时,他身体很虚弱,但仍然乐观,安慰我:“医生说只有半年时间,现在我已经熬过一年多了,每一天都是赚回来的,我们都要好好活下去。”

言犹在耳,眨眼间,他已过世三年,我舍不得删去他的信息。人生太快,缘分太短。我们总觉得有无数的时间可以跟亲友见面,但没想到无常才是常态,有时候一次普通的分别可能天人永隔。

前段时间一个年轻人突然有些伤悲,说自己孤身在外,有可能跟父母见面只有过年的十几次,哪怕一年见两次面,也只能见上二三十次,这辈子就过去了。

我想,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,用一期一会的心态,才能在体会无常的同时,积极地度过此生。每一次见面,都把当下的见面当作永恒,互相给予鼓励,给对方带来快乐,不轻易指摘他人,不强行介入他人的因果。

春节也好,重阳也罢,或者任何一个寻常的日子,见亲友时当作一期一会,当作此生难得的快乐时间,不必要天天相伴。享受了,心到了,也就没有遗憾了。

（摘自《新民晚报》）

（摘自《今晚报》）

（摘自《新周报》）

愿意让一个不懂哲学的好朋友来复述我的话。”

为什么呢?因为忠诚的蠢人总是会把你观点,降到他的高度去理解。每次看到罗素这句话,我就不禁哑然失笑。嘿,这才是值得不断阅读的书——不仅有知识,更多的是有智慧。

（摘自《新周报》）

（摘自《新周报》）

（摘自《新周报》）

（摘自《新周报》）

# 罗素的哲学

杨光祖

罗素的《西方哲学史》,是我经常翻阅的书。有些学者说,他的书不严谨,梯利的哲学史好。但我还是更喜欢罗素,何兆武、李约瑟等人的译文也挺好。

罗素说:“我就宁愿让一个是我自己的死敌的哲学家来复述我的话,而不

愿意让一个不懂哲学的好朋友来复述我的话。”

为什么呢?因为忠诚的蠢人总是会把你观点,降到他的高度去理解。每次看到罗素这句话,我就不禁哑然失笑。嘿,这才是值得不断阅读的书——不仅有知识,更多的是有智慧。

（摘自《新周报》）

（摘自《新周报》）

（摘自《新周报》）

（摘自《新周报》）

（摘自《新周报》）

（摘自《新周报》）

（摘自《新周报》）

（摘自《新周报》）

（摘自《新周报》）

（摘自《新周报》）

（摘自《新周报》）

（摘自《新周报》）

（摘自《新周报》）

# 一期一会,度过此生

叶檀

春节期间,给舅妈打电话问好,她说:“我刚祭拜过,你二舅过世已经三年了。”

我跟二舅之间有特殊的联结,从小很熟,感情极深。我患癌之前半年,二舅检查出来得了风险很大的恶性肿瘤,医生给出的时间是半年到一年。我们一起抗癌,时时互相鼓励。

他最后一次住院前给我发语音消息,当时,他身体很虚弱,但仍然乐观,安慰我:“医生说只有半年时间,现在我已经熬过一年多了,每一天都是赚回来的,我们都要好好活下去。”

言犹在耳,眨眼间,他已过世三年,我舍不得删去他的信息。人生太快,缘分太短。我们总觉得有无数的时间可以跟亲友见面,但没想到无常才是常态,有时候一次普通的分别可能天人永隔。

前段时间一个年轻人突然有些伤悲,说自己孤身在外,有可能跟父母见面只有过年的十几次,哪怕一年见两次面,也只能见上二三十次,这辈子就过去了。

我想,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,用一期一会的心态,才能在体会无常的同时,积极地度过此生。每一次见面,都把当下的见面当作永恒,互相给予鼓励,给对方带来快乐,不轻易指摘他人,不强行介入他人的因果。春节也好,重阳也罢,或者任何一个寻常的日子,见亲友时当作一期一会,当作此生难得的快乐时间,不必要天天相伴。享受了,心到了,也就没有遗憾了。

（摘自《新民晚报》）

（摘自《新民晚报》）

（摘自《新民晚报》）

（摘自《新民晚报》）

（摘自《新民晚报》）

（摘自《新民晚报》）

（摘自《新民晚报》）

（摘自《新民晚报》）

（摘自《新民晚报》）

# 人样的神

许渊冲

作读书报告时,我曾讲过张天翼《谈人物的描写》:

第一,写好故事不如写好人物,因为好故事只能读一遍,好人物却让人百读不厌。

第二,写人物不要写成神样的人,可以写成人样的神,如孙悟空。

第三,写人物不要写他的大处,而要写他的深处;不要写冠冕堂皇的演说,而要写他的私生活。

谈到私生活,我又引用林语堂《生活的艺术》中的话说:

试想一个世界,如果夫妻都能白头偕老,如果君主都活万岁千秋,那个幸福的世界有什么趣味呢!世上就没有文学了。正如一次赛马会,假如每个观众都预先知道哪一匹马会取得胜利,那还有谁来看赛马呢?显而易见,不能让理性单独统治世界,而要让情感来平分天下。

（摘自《许渊冲百岁自述》华文出版社）

（摘自《许渊冲百岁自述》华文出版社）

（摘自《许渊冲百岁自述》华文出版社）

# 春天的使者

聂睿

清晨,突听一阵“叽叽喳喳”的声音,刚开始以为是歇息在对面楼顶上的鸟儿,可这声音很近,似就在客厅的阳台。我趿上拖鞋,轻着脚步出去查看。

只见阳台上有一只翠色的鸟,颌部微微泛黄,胸脯则为白色,身形轻盈,竟像是暗绿绣眼鸟。阳台的窗玻璃只推开了一点,大概就是它进来的地方。

“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”,此时,这份春暖最先感知的,是眼前这只不请自来的鸟儿,像是把春天悄悄衔进了我的阳台。

它在阳台的地板上一蹦一跳的,“啾啾”清脆地唱着歌,也不着急飞出去。见我过

在观察,“啾——啾——”竟真的靠了过来,啄我手上的葡萄果肉,也准我用另一手轻轻抚摸。我从口袋取出手机,想将这一幕录下分享到朋友圈,刚打开镜头对向它,它仿佛察觉到了,扑棱一下飞起,穿过敞开的窗户,落进了小区树木中。

我有些怅然,同时也猛然听到,窗外鸟啼声此起彼伏,像是一曲春天的合唱。

微风拂进,带着初春的清气。不必在朋友圈里追春,走出去,春天会迎面而来。你呢,我的朋友,你已多久没有放下手机,走进春天的怀抱,畅游一下大自然了?

（摘自《扬子晚报》）